

· 社会学研究 ·

外企中方高管：远离政治的社会新阶层？^①

——以世界 500 强驻京外资企业中方高管为主体的 一项考察

吕 鹏

(清华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084)

摘要: 驻华外资企业中方高级管理技术人员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参与程度不高, 是因为他们在利益上与资产阶级更加接近, 并且很少参与企业外部的政治活动。但是, 他们进一步团结的基础和趋势是强势的, 其代表资方影响政府决策能力的机会和能力也呈上升趋势。因此, 作为潜在的政治主体, 如何规范他们的利益表达, 引导他们的政治意识, 就成了一项紧迫的课题。

关键词: 社会新阶层; 外企高管; 商业精英; 政治生活

中图分类号: C91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860(2008)04-0064-04

与近些年来众多私营企业家越来越主动地卷入公共议题或开始高调参与政治生活不同, 同样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社会新阶层”或“中国新商业精英”^{〔1〕〔2〕}, 驻华外资企业的中方高级管理技术人员(以下简称“外企中方高管”)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声音及参与程度仍然显得是那么地若有若无。这究竟是他们自身的原因, 还是由于受到了某种制度性因素的限制? 该如何看待外企中方高管目前的“政治生态”及其在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 本文试图从社会学阶层分析(class analysis)的角度出发, 将“外企中方高管”看作“社会新阶层”中一个特殊的“地位群体”, 在与其他类似群体进行比较研究的框架内, 对上述问题做一个初步的回答。在此基础上, 本文还

将就如何提高外企中方高管的政治参与度、规范他们的利益表达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在商言商”: 外企高管的社会位置如何影响其政治意愿?

外企中方高管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低调, 可以通过两个对比得到印证。一是与私营企业主相比, 同样是“社会新阶层”, 同样是掌握了大量资源的“商业精英”, 我们却很少在公共议题上发现外企中方高管的声音。不仅如此, 就政治参与而言, 以北京市为例, 截至 2005 年, 私营企业主已有 28 人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 61 人被推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而外企中方高管则为零; 二是与政治

收稿日期: 2006-12-10

作者简介: 吕鹏(1981—), 男, 安徽芜湖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

①本文缘起于笔者于 2006 年 2 月起参与的一项名为“世界 500 强外资企业中方高级管理技术人员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及其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的课题。该课题由北京市委统战部承担。感谢课题组允许我使用在本文中公开的调查资料, 并在调查中给予了重要帮助; 同时感谢我的导师孙立平先生、课题组几位同志在思路、观点、素材等方面提供的启发、指导和帮助。当然, 本文并不在任何意义上代表任何组织或他人之观点, 而其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错误, 也应该完全由作者本人负责。

生活中的低调相比,外企中方高管在经济生活中显得颇为高调。他们频频以权威或“成功人士”的面貌出现在各种财经类报刊杂志的报道之中,其言行对本行业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差异?一个似乎最直截了当的回答是,外资企业中的中方高级管理技术人员没有很高的政治热情。然而,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解释不如说是重复描述。社会学“阶层分析”的规范启发我们将他们所处的“结构位置”对主观政治意愿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作为解释的理论框架,以揭示他们之所以“政治后卫”的原因和机制,并以此作为下一步预测性分析的基础。

那么,外资企业中方高管所处的“结构位置”是什么呢?若与国有企业中的高管相比,外企中方高管在结构上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他们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当然是相对的,例如他们的档案就仍然由北京外企服务集团(Fesco)这样的第三方保管,但“雇主对档案往往并不感兴趣,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1] (P86)},他们事实上在职业流动、薪金待遇等方面已几乎不再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限制;加之 Fesco 自身的功能也已从管理为主转变成服务为主,外企高管不再可能像国企高管那样,因与国家的“结构性结合”(structural tie)而必须将政治作为工作生活中的关键考量。

然而,同样拥有很大自主性的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和程度却逐年增加。显然,除了自主性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因素,使得外企高管不但“敢于”不关心和参与日常政治生活,而且“不能”或“不需要”像某些私营企业主那样涉入公共领域。本文认为,他们在公司内部科层制和整个社会分层中所处的位置,是决定这些因素的基础。也正是这种位置,使我们对他们政治意愿和能力的分析变得复杂起来。

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从表面上来看,就本文所研究的世界 500 强驻华机构高管人员而言,他们已绝不是普通的白领甚至“杂领”,而是名副其实的“金领”,是“被雇佣的中产阶级”中最高

端的一批人,无论从经济能力、社会关系、闲暇时间还是利益诉求的角度考虑,他们似乎都应该比稍低一级的白领有更强的政治能力和政治意愿。然而,实际上,可能存在某些因素,使他们在政治意愿和行动能力上反而比别的中产阶层更加消极或弱势。例如,与 2001 年中美撞机事件后的“中美黑客大战”、2005 年上海部分白领参与的“4·16 涉日游行”等事件中“小白领”们所表现出来的“强政治取向”不同,我们的调查对象在这些或类似事件中几乎都采取了回避的立场。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认识到,高管并不会因为他们在经济上的壮大而自动地在政治上更加主动;尤其对跨国公司中的高管而言,他们处在一种矛盾的位置上:一方面,位置越高,就会在利益上与拥有这些公司的资本家阶级越接近,这使得他们与从事较低层管理工作的、在特征上更接近工人阶级的普通白领在利益诉求和表达方式上存在某种差异;另一方面,虽然他们能够对所在部门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甚至公司的若干重大决策发挥重要影响,但如果遇到需要在公司外部通过政治渠道来落实利益的场合,则仍然主要依靠资方外籍高层与中国政府高层的沟通或谈判,大部分中方高管在这方面的政治资源依然有限^①——这一点,是他们与拥有相似经济收入水平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重要区别之一。

受上述结构位置的制约,加之几乎所有的公司在制度上禁止员工涉足政治,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术语,外资企业的中方高管形成了一种自己认为自己与政治无关的“惯习”^{[2] (PP157-186)}。换句话说,他们自我放弃了参政议政的可能,在主观上对政治层面的议题兴趣不大,甚至隐瞒个人政治背景和立场——所有的这一切,使外企中的高级管理技术人员似乎成了一个“远离政治”的群体: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商业精英,但经济权利意识强于政治权利意识,远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积极的政治力量。这种情况,很容易让人想起社会学家米尔斯在 1950 年代对美国新兴白领阶层的描述,认为他

^①这里还涉及到一个中方高管在关键职务上的数量和结构的问题。目前,虽然由于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拥有中国国籍的华人在管理层的人数呈上升趋势,但其中占据总裁、副总裁、大中华区经理这样能“独当一面”职务的还是偏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企中方高管未来的政治走向,与他们能否在数量和结构得到加强不无关系。

们是独善其身的政治“局外人”^{[3] (P366)}。事实上,也的确有学者认为,从中国的“新商业精英”中无法发育出在政治上成熟的市民社会。^[1]

二、变数:如何评估外企高管的政策影响力和政治潜力?

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拓宽”和“下移”的话,就会发现存在着一些因素,使得上述的情况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发生某种变化。

第一个因素是,外企中方高管作为一个地位群体的凝聚力 (cohesion) 呈逐渐加强的趋势。的确,如果将某一群体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排他性”作为衡量其凝聚力最重要的指标^{[4] (P56)},那么目前,无论是政治凝聚力,还是社会凝聚力,外资企业中方高管都显得比较薄弱。政治凝聚力低是政治冷漠的必然结果,而社会凝聚力不强的原因则包括未曾受过排他性的精英教育、经历和来源相对复杂等,而由于工作强度大,不少高管参与(排他性的)俱乐部、会所等社交场所的时间也非常有限。

但是,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高管们对自己作为“中等阶层”(中中层)乃至更高阶层(中上层、上层)有着比较一致的身份认同,在我们调查的问卷中,认同自己属于“中等阶层”的有 46.67%,在此之上的则有 37.33%。认同的基础当然首先是经济收入,但通过消费方式、生活品位、审美格调等因素形成的文化上的身份认同正在逐渐加强。与广义上的中产阶级呈现出的“多元分割”特征相比,作为其中一个特殊地位群体的外企中方高管,其进一步团结的基础和趋势显然要强势得多。

第二个因素是,中方高管代表资方影响政府决策的机会和能力呈上升趋势。机会增多是由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获得更加关键的职位,这甚至使部分高管获得了不受公司关于管理层须回避政治的禁令限制的“资格”和自主性。能力上升则表现在高管自身社会网络的加固及扩大,这为他们影响甚至参与政策决策过程提供了可能。事实上,对政策议题保持敏感和公开讨论在管理层向来不被禁止,结识同行和利益相关人士并建立属于自己的关系网更是

大部分高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西方学界的说法,商业圈子内的团结和协调是商业精英们联合起来发出声音的基础,而更有中国学者指出这种联合很可能会影响国家在政策制定上的自主性,并最终带来政治上的后果。

当然,需要承认的是,目前的态势是,大多数外企中方高管建立和使用社会网络的目的是非政治的,而是经济动力使然;社会网络建立的途径也尚未固定化、制度化,也正是因为此,他们对通过正式渠道或非正式的固定场合与同行实现有效沟通的愿望强烈,而他们未来的政治发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亦取决于这种沟通的程度和方向。我们在下面一节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个因素,或许也是对未来影响更大的一点是,作为未来高管“后备军”的中低级主管,无论是凝聚力还是社会网络,都更加强势。例如,我们的调查中有 29.33%的高管过去在国有企业工作,48.67%一直在外企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外企高管只拥有外企工作的经历,这种来源和经历的单一化对他们社会凝聚力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再比如,越来越多的中低级主管通过诸如 MBA、EMBA 等各类培训进修机构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大多数高管已无需参加这样的培训),这种网络无论从亲密程度还是内部约束力的角度来看,都比仅仅通过俱乐部建立的网络要强化得多。考虑到前面提到过的普通白领在某些事件上的“强政治取向”,待作为过渡的第一代高管卸任后,与现有体制更加疏远、结构自主性更高的二、三代高管在集体行动上的取向值得关注。

三、结语:如何引导商业精英的利益表达?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只有当中产阶层在数量上达到一定规模,且他们的利益期望得到社会容纳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成为社会的“稳定器”,否则可能导致社会动荡或寡头独裁。显然,作为潜在的政治主体,人数不断增长的外企中方高管参与政治的情况存在着变数。于是,如何规范他们的利益表达,引导他们的政治意识,成了一项紧迫的课题。事实上,自 2001 年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发表以来,

尤其是党的“十六大”宣布“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5]之后，吸收商业精英参与政治生活的步伐明显加快：不仅出现了第一批私营企业家身份的省级政协副主席，党代会、人代会上私企老板的面孔也多了起来。

但是，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指出的那样，就吸收外企中方高管参政议政而言，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在今天，让 Fesco 这样的企业像以前那样严格控制外企高管的政治生活，已不可想象；而让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参与到人民政协这样的统一战线组织中来除了要解决推荐渠道、体制定位等操作层面的问题外，如何调动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打消他们的各种顾虑，则是个更加棘手的问题，成败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党政机关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结构位置或外部环境在未来几年是否会发生重大变化。

现实问题的存在呼唤制度创新。其实，未必要对所有人都采取“进政协、进人大”的方式，也未必要将这样一群政治冷漠的人动员和组织成政治热情高涨的群体，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样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如何给各利益主体提供符合他们特点的^①利益表达渠道。当前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日益扮演重要角色的各专业协

会、社团、决策咨询机构完全可以在商业精英的利益表达方面发挥更加建设性的作用。就外企中方高管而言，在未来几年内，随着人数壮大、第一代高管退休高峰来临等问题的浮现，他们与雇主发生利益冲突，或者卷入社会运动中（当前业主维权运动的兴起可以被视为一个前兆）的可能性会增加。由于许多人没有体制内的工作经历，虽然普遍抱有强烈的爱国热忱和回馈社会的心愿，但对党政部门的工作仍存有疑虑，甚至成了与体制最疏远的政治边缘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未雨绸缪，及早搭建起有效的沟通平台，使他们实现个人与体制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参考文献：

[1] Pearsall, Margaret.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2] 布迪厄. 实践与反思 [M]. 李猛, 李康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3] 米尔斯. 白领: 美国的中产阶级 [M]. 杨小东等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4] Useem, Michael. "Corporations and the Corporate Elite"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0, Vol. 6
[5]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R]. 2002

责任编辑 周文彬

Top Chinese Managers in Foreign Enterprises:
A New Social Class Far from Politics?
—— An investigation of top Chinese managers in foreign
enterprises of top world 500 in Beijing

LV Pe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op Chinese managers in foreign enterprises in China seldom get involved in public political life in or outside the enterprise since they are economically related to capitalists. However, there is a strong basis and tendency for their further union and the opportunity and ability to influence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on behalf of capital are also increasing. Therefore, it is an urgent subject to standardize their expression of interest and direct their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s a potential political subject.

Key Words: A New Social Class; Top Managers in Foreign Enterprises; Business Elite; Political Life